



FOCUS

高层动态

2021年11月29日

兰瑞智库
经济战略研究

指点江山

思入风云

菩提明镜

大道之行

主办：兰瑞智库经济战略研究中心

<http://www.runwaysys.com>

全国客服热线：4001182162

E-mail: runwaysys@163.com

在中国的国情下，中央高层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性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中央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高层的决策？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

本报告力图提供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框架，将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从而达到把握最重要的决策要点的效果。

本报告力求提供的参考意见是有价值的，望您善加利用并慎重决策。



本期目录

最新动向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中俄科技创新年闭幕式致贺信】	3
【习近平：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攻坚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3
【李克强出席第十三届亚欧首脑会议非正式会议】	5
【李克强：优化营商环境 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6
【郭声琨：以更高政治站位更紧密联系实际谋划做好政法工作】	6
问题探射	7
【当前小企业生存究竟有多难】	7
【防止房地产市场下行引发经济硬着陆】	11
【共同富裕要超越分配 核心是破除社会身份体制】	12
人物关注	16
【吴政隆当选江苏省委书记 惠建林、潘贤掌新任省委常委】	16
智囊高参	19
【刘世锦：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	19
【刘元春：中国房地产短期稳定与中期改革必须并行推进】	22
虎视寰球	24
【德国“红绿灯”新内阁来了】	24
【杀油价 拜登终于亲自动手了】	26
【美继续制裁“北溪2号” 欧洲今冬天然气供应难上加难】	28
华夏透视	30
【中国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的政策实践与创新】	30



最新动向

为什么要对中央高层的最新动向紧密跟踪？因为他们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性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对高端决策来说，高层动向的紧密跟踪是研究分析的关键性资源。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中俄科技创新年闭幕式致贺信】

11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中俄科技创新年闭幕式致贺信。习近平指出，2020年8月中俄科技创新年开幕时，我和普京总统分别致信表示祝贺，寄予厚望。一年多来，中俄两国共同携手，克服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创造性实施千余项科技创新合作交流项目，积极推动两国在疫情防控、航空航天、核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取得一批丰硕合作成果，中俄联合科技创新基金成功启动，战略性大项目合作取得重要进展。实践证明，中俄两国科技创新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习近平强调，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共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双方要秉持世代友好、合作共赢理念，务实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促进中俄关系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迈进，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普京在贺信中表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俄中科技创新年成功举行，充分展示了两国在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开展科技合作的重大意义。两年来，俄中科研工作者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落实了千余项科研活动。中方参与重离子超导同步加速器（NICA）大科学装置建设、双方成立俄中数学中心等成为其中最主要的合作成果。相信双方将继续秉持世代友好、合作共赢理念，为推进俄中全方位合作不断注入强劲动力。中俄科技创新年当日闭幕。（据新华社）

[Top](#)

【深改委：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攻坚 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11月24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2021—2023年）》、《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意见（试行）》、《关于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施意见》、《关于支持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先行先试改革的若干措施》。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开展科技体制改革攻坚，目的是从体制机制上增强科技创新和应急应变能力，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锚定目标、精准发力、早见成效，加快建立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体系，提升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要遵循电力市场运行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优化电力市场总体设计，实现电力资源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共享互济和优化配置，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高效、治理完善的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要在中小学校建立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保证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小学校得到贯彻落实。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来，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要支持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更好发挥科技资源和制度创新优势，开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先行先试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系统布局 and 整体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科技领域基础性制度基本确立，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啃下了不少硬骨头。但是，同新形势新要求相比，我国科技体制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还没有根本破除。

会议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党和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高效组织体系，建立使命驱动、任务导向的国家实验室体系，布局建设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改革创新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加强体系化竞争力量。要优化科技力量结构，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推动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要完善科技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等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在履行国家使命中成就人才、激发主体活力。要以更大勇气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坚持抓战略、抓改革、抓规划、抓服务的定位，强化规划政策引导，加强对重大科研项目的领导和指导，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指导和服务。要根据任务需要和工作实际向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充分授权，建立责任制，立“军令状”，做到有责任、有管理、有监管，用不好授权、履责不到位的要问责，保证下放的权限接得住、用得好。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稳步有序推进，市场化交易电量比重大幅提升。要健全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快建设国家电力市场，引导全国、省（区、市）、区域各层次电力市场协同运行、融合发展，规范统一的交易规则和技术标准，推动形成多元竞争的电力市场格局。要改革完善煤电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完善电价传导机制，有效平衡电力供需。要加强电力统筹规划、政策法规、科学监测等工作，做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兜底，确保居民、农业、公用事业等用电价格相对稳定。要推进适应能源结构转型的电力市场机制建设，有序推动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科学指导电力规划和有效投资，发挥电力市场对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支撑作用。

会议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中小学校的全面领导，要在深入总结试点工作基础上，健全发挥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作用的体制机制，确保党组织履行好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领导职责。要把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重要任务，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学校教书育人的坚强战斗堡垒。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抓好学生德育工作，把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深刻融入到学校教育中来，厚植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努力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加强分类指导、分步实施，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学校，在做好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工作准备的前提下，成熟一个调整一个，推动改革落到实处。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物事业得到很大发展，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不断提高。要加强文物保护总体规划，统筹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筑牢文物安全底线。要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更好体现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要创新转化手段、强化平台建设、夯实人才基础、完善体制机制，以实施重大项目为牵引，提升文物科技创新能力和各项工作保障水平。要开展创新服务，使文物更好融入生活、服务人民，积极拓展文物对外交流平台，多渠道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

会议指出，支持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先行先试改革，要瞄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最突出的短板、最紧迫的任务，在做强创新主体、集聚创新要素、优化创新机制上求突破、谋创新，加快打造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和创新高地。改革要拿出更多实质性举措，起到试点突破和压力测试作用，积极探索破解难题的现实路径，注意积累防控和化解风险的经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据新华社）

[Top](#)

【李克强出席第十三届亚欧首脑会议非正式会议】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1 月 26 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第十三届亚欧首脑会议非正式会议并发表讲话，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同各国领导人交换意见。柬埔寨首相洪森主持，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

李克强表示，亚欧会议是亚欧之间规模最大的政府间论坛，53 个成员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六成，经济总量占世界一半，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七成，在国际政治经济版图上有着重要影响。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与合作之桥。当前亚欧国家共同面临应对疫情挑战和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议题，既要有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也要坚持团结合作这一正确的途径和办法。要坚持自由贸易，保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明年如期生效实施，将为地区经济复苏提供新的动力。

李克强指出，亚欧各国历史文化不同，发展道路各异，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关键是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时，要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坚持不干涉内政大原则，发挥好相关机制的作用，以符合实际的方式去推动解决。李克强强调，相信经过亚欧各国共同努力，我们不仅能够有效推进疫情防控，而且能够更好实现经济复苏，维护亚欧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造福亚欧和世界各国人民。何立峰出席会议。（据新华社）

[Top](#)



【李克强：优化营商环境 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11月22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市长龚正陪同下，在上海考察。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打造有利于各类市场主体蓬勃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经济平稳运行，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李克强对这里通过改革开放在投资、贸易、金融等方面形成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予以肯定。他说，你们作为全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要继续先行先试、取得新经验，更好为全国作示范。李克强考察了外高桥国际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了解高端智能设备研发等情况，与多家外资企业负责人交流。他说，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投资负面清单越来越短，你们多年在中国发展，应当能感受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并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使更多外资企业放心在华投资兴业。李克强强调，中国企业要面向世界、拓宽视野，在开放中增强竞争力。即将生效的RCEP将形成全球最大自贸区，要用好更大程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机遇，拓展合作共赢空间。

李克强考察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公司。他说，电力是经济运行动力，要采取措施千方百计保障民生和企业正常生产用电。发电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多出力出足力。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支持，包括落实好国家对煤电企业缓税等政策，做好协调调度，保证电煤稳定供应，解决一些地方电力缺口问题，防止出现新的“限电停产”现象。要立足我国能源禀赋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用好国家新出台的专项再贷款政策，推广提高能效的成熟先进技术，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李克强走进就业促进中心，听取上海市推动就业扩大和灵活就业等情况汇报。在中心实训现场，李克强与参加技能培训的学员们交流，勉励说现在高技能人才短缺，希望你们珍惜机会，掌握精湛技术，增强就业能力。李克强询问在场中小微企业负责人有什么困难，最希望国家出台哪些方面政策。大家普遍建议继续给企业减税降费。李克强说，我们正视你们的困难，会继续采取措施帮助解决，这样也会使你们更有信心。继续围绕市场主体期盼制定政策，保住市场主体这个“青山”，也就能保住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人民勤劳肯干，要持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带动更多就业，激发更大创业创新活力，发挥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顶住下行压力，实现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李克强充分肯定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希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在改革开放、开拓创新上走在前列，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据新华社）

[Top](#)

【郭声琨：以更高政治站位更紧密联系实际谋划做好政法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11月25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以更高政治站位更紧密联系实际，只争朝夕做好年末工作，谋划部署明年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郭声琨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着力推动政法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要准确把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找准切入点、着力点,深入分析研判面临的形势任务,科学谋划政法工作思路举措,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置于首位,聚焦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重点工作精准发力,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

郭声琨要求,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大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巩固拓展教育整顿成果、锻造过硬政法队伍为有力保障,以改作风、抓落实、提效能为鲜明导向,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切实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赵克志、周强、张军出席。(据新华社)

[Top](#)

问题探射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问题将被高层关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问题的发展和解决方式将怎样影响相关问题和同类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影响我们的宏观环境?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本栏目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得我们对于高层动向的追踪变得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功能性,其方法对我们的决策分析具有启迪意义,也将极大提升我们的决策分析的利用价值。

【当前小企业生存究竟有多难】

如果说市场主体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底气、韧性所在,那么针对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困难,及时出台纾困措施则是保持经济增长韧性的关键,也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当务之急。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针对当前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面临的经营困难,出台了九大举措。在畅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小企业恰如循环中的轴承,将社会生产、就业、居民收入与消费等串联起来,其重要性毋庸置疑。那么,小企业当前的生存状况究竟如何?小企业究竟面临哪些亟需纾解的困难?或是我们需要首先弄清的问题,唯此方能使政策有的放矢。

从前三季度公开发布的各项指标、指数以及研究报告看,当前市场各方对小企业的现状研判不甚明晰,对小企业的现状与发展前景,看法存在分歧,审慎与乐观并现。一方面,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中小企业发展指数(SMEDI)显示小企业各项经营指标劣化,景气度下降,经营承压。

从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指数看,小企业PMI指数无论从当期水平、环比变动还是历史走向,均明显弱于大、中型企业,不仅显露了小企业本身



固有的弱质性，也凸显了小企业生存压力。总体看，大、中型企业基本还荣枯线上下波动，而小企业 PMI 与荣枯线的负向差在增大（见表一）

表一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大中小企业分项指数比较

指标名称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10月末	比上月	10月末	比上月	10月末	比上月
PMI	50.3	-0.1	49.6	-1.1	47.5	0
生产	50.1	0.2	47.5	-2.6	45.8	-1.9
新订单	50.6	-0.4	47.7	-1.1	46.1	-0.2
新出口订单	47.3	0.8	47.1	1.5	41.3	-4.6
在手订单	46.8	-0.1	44.6	-0.7	41.5	-1.4
产成品库存	46.1	-1.2	47.2	0.7	45.4	-2.4
原材料库存	47.7	-0.9	46.3	-2.9	46.4	0.5
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	72.3	9.2	72.4	7.1	71.4	9.5
出厂价格	61.6	4.5	61	4.9	60.1	4.8
供货商配送时间	47.2	-1.2	46.5	-1	45.9	-2.5
生产经营活动预期	55.8	-2.1	52.9	-3.9	49.4	-3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发布的 10 月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SMEDI）显示，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在连续 4 个季度上升后，已连续两个季度下降。另一方面，一些微观调研分析对小企业运行持乐观态度，认为小企业运行状况良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发布的小企业运行指数显示，小企业运行虽仍在荣枯线之下，但发展态势较好，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尽管对小企业发展前景不乏乐观的预期，但综合国际国内形势，小企业生存环境依然严峻是毋庸置疑的。

一是成本上升，经营压力增大。

今年特别是三季度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要素购进价格持续攀升，叠加海运运费飙升、人力成本刚性上升等多重因素，持续推升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反映为 PPI 不断冲高，三季度末 PPI 同比上涨 6.7%。而小企业面临的压力明显大于大中型企业。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推算，9 月末小企业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同比分别增长 25.5%、25.83%，反映为小企业利润增长远不及大中型企业。

表二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累计）

	营业收入同比	营业成本同比	利润总额同比	财务费用同比	存货同比	产成品存货同比	企业亏损面
工业企业	22.20	21.30	44.70	-1.10	16.3	13.7	20.59
大中型企业	22.80	21.30	53.60	-4.00	16.8	14.4	19.96
小型企业	25.50	25.83	27.02	7.44	19.27	16.09	20.68

由于小企业处于大中型企业中上游环节，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明显，下游需



求增长乏力，小企业议价能力和成本转嫁能力有限，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更为深刻的原因是，小型企业在经营转型、产品创新研发方面不足，一旦外部需求放缓，产业链与供应链、物流受阻，势必对小型企业成本与需求构成压力。

二是订单不足，市场需求承压。

表一中的 10 月 PMI 分项指数显示，小企业新出口订单、在手订单分别为 41.3 和 41.5 低位运行，且环比下降明显，分别下降 4.6 和 1.4 个点。导致小企业出口新订单下降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企业主动减少订单。进入下半年以来，在国际大宗商品持续涨价背景下，全球运费不断上行，中国运输生产货运指数同比增长 1.5%（见图一）。叠加原材料等成本上升压力，小企业生产与销售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尽管由于疫情反复，东南亚等国的订回流中国，表现为外部需求旺盛，但企业不敢大规模接单，扩大产能意愿不足，一些企业宁可暂缓接单。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或逐渐修复，小企业面临订单转移的压力。虽然小企业各项运行指数疫情以来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小企业运行总指数 44.5，为疫情以来最高，但总体仍在荣枯线之下。随着我国在抗疫中率先复苏所吸引的全球订单势必逐渐被分流。

三是回款减缓，资金链条趋紧。

从资金链看，小企业销货款回笼速度减缓，应收账款增加，流动资产占用上升，资金链趋紧的态势在逐渐增强。央行三季度企业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三季度企业销货款回笼速度减缓，资金周转速度变慢（见表三），导致企业资金链条趋紧。企业销货款回笼速度减缓意味着应收账款的增加。《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 2021 年三季度报告》虽对小微企业发展态势总体偏乐观，但也指出，从现金流维持时间来看，三季度小企业现金流状况维持平均值为 2.9 个月，偿债压力明显高于 2020 年。

表三 央行三季度企业家问卷调查情况 (%)

指标名称	资金周转指数	资金周转状况			销货款回笼状况指数	销货款回笼状况		
		良好占比	一般占比	困难占比		良好占比	一般占比	困难占比
2021-06	60.30	34.20	52.30	13.50	64.40	36.50	55.80	7.70
2021-09	59.90	33.60	52.70	13.80	63.90	35.70	56.40	7.90



四是汇率波动，汇兑风险增大。

今年以来，人民币处于不断震荡、升值过程中。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去年末的 6.5398 升至 11 月 25 日的 6.3856，累计升值 2.42%。期间大起大落，4 月 1 日回落到 6.5739，5 月末又快速攀升至 6.3607。

人民币汇率波动变化对外贸出口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影响明显。实际上，在当前国内消费低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持续下滑背景下，小微企业的订单主要依赖外需。而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对于生产低附加值出口商品、缺乏定价权的小企业压力较大，其微薄的利润空间很难经受住汇率波动带来的汇兑损失风险。对于浙江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小企业冲击尤为明显。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当前小微企业营收增加效益下滑的现状。

五是资金宽裕，但有效需求不足。

今年以来，在国家相关政策引领与激励下，金融机构切实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精准支持制造业、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企业正常融资需求得到了较好满足。

尽管市场上关于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呼声一直很高，各级政府部门也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操碎了心。但客观地看，当前小企业融资需求上升与有效需求下降的矛盾突出。一方面，如前所述，小微企业资金链条趋紧，货期的延长、成本的上升、资金占压的增加使部分企业融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从市场理性出发，小微企业的有效融资需求实际上是在下行（见下表四）：

	贷款需求指数	贷款需求指数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2021-03	77.50	63.80	66.80	76.50
2021-06	70.50	59.10	62.30	72.30
2021-09	68.30	56.20	60.70	72.10

央行三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反映，贷款需求总体呈现下降态势。由于前期在各种纾困政策推动下，很多企业已经获得大量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在未来预期趋落情况下，小企业在融资方面总体趋于谨慎。在实践中，这种贷款有效需求的下降，一方面表现为实体企业用信率较低。多家大中型银行反映，今年以来公司类贷款提款量明显下降，实体企业“节衣缩食”“储粮过冬”意识强烈。另一方面，也出现民营新增投资流向贸易、金融、非工业生产等领域的趋势。从宏观层面的货币供应量 M1、M2 增速及其剪刀差变动态势看，也印证了实体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见图 2）。





10月末，M1、M2 同比分别增长 2.8%和 8.7%，M2 与 M1 的剪刀差已扩大到 5.9 个百分点。这表明宏观经济走势趋于疲软，微观个体盈利能力下降，可选择的投资机会有限，小微企业投资意愿下降。

显然，当前小微企业面临的困难并不止于上述五个方面，对小微企业的纾困需要宏微观的统筹兼顾、相关部门的联动。针对企业成本上升、应收账款占用增加等实际，银行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对企业的授信额度及期限的设定；对于企业订单特别是外贸企业订单下降的情况，银行机构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汇率避险政策工具，在不增加企业负担、实现各方风险合理分担、防范道德风险的前提下，更好地满足小微外贸企业汇率避险需求，有效帮助小企业稳定预期。

这就需要金融机构平衡好风险防控与对小微企业纾困的关系，把服务小微企业与国家宏观决策、自身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把纾困小微企业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最好切入口。金融机构既要放眼长远，站在自身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待对小微企业的纾困，也要立足风控，要从分散信用风险视角看待服务小微企业。当然，需要清楚的是，小微企业到期是缺钱还是缺市场需求；支持小微企业也不应仅限于融“钱”，更需要融“智”。

【来源：新浪意见领袖，作者：李庚南，先后供职于工商银行、人民银行，现为银行监管部门人士，长期负责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工作，潜心研究小企业金融服务问题】

[Top](#)

【防止房地产市场下行引发经济硬着陆】

过去几个月中国房地产业各项指标急转直下，如何防止房地产市场的严峻形势引发经济“硬着陆”，已成为当下的热点话题。

始于 2020 年秋季的这轮房地产调控，直指房企杠杆和银行信贷供给，是有史以来中国对房市的最严厉调控。加之房地产行业本已是强弩之末，目前，房企债务违约率已经攀升，海外高收益美元债哀鸿遍野，若现有调控政策不作大幅调整，未来几个月债务违约率可能加速上升，或将引发更大的金融风险。

宏观调控部门可能已陷入两难。一方面，即使调控政策执行力度已有所放松，以房地产占中国经济 25%的比例来估计，未来几个季度萎缩的房地产业或将拉低 GDP 增速 4 个百分点。宏观经济是一个整体，一段时间内种种问题导致的经济失速，会引发经济各部门和金融体系之间的恶性循环，之后往往需要政府大幅刺激才能让经济增长回归正轨。另一方面，若此时大幅放松调控乃至刺激地产业，会强化房价永远上涨、政府永远呵护地产的预期，房企、居民会再度大加杠杆，全国房价可能出现新一轮报复性反弹。现如今，中国房企的高周转模式、高杠杆问题，以及爆雷频频的美元债市场，都和过去的刺激政策有关。

房地产市场如何走出周而复始的“紧缩—放松”循环？如何寻找本轮房地产调控的最佳路径，既防止经济硬着陆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又能维护政策的一贯性，实现稳定房价预期、降低居民和房企杠杆、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住有所居的多重目标？我认为，理想的房地产调控应注重两个关键：一是做好预案，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无需赘言，成功的房地产调控必然是渐进的软着陆的，必须准备必要的对冲工具，设计好合理的退出机制；二是要与其他政策做好协调，不能给宏观经济稳定太大的压力。坚持当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不现实，盲目放松和大水



漫灌也不可取。当前，地产萎缩对经济、财政的影响还未完全体现，政策上必须有所作为。应该看到，短期内没有哪个行业能够取代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位置。

此外，中国城市化尚未完成，有 2 亿多农民工要向城市迁徙，每年有 800 多万大学毕业生，人口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迁移是必然趋势，大量城市住房需求仍旧存在。基于此，我以为，作为短期内的应急措施，为避免经济硬着陆，有必要保障大部分资质较好的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和家庭按揭贷款的正常审批。但长期看，真正的出路在于市场和公共保障并举，通过供给侧改革，让市场和政府各就各位来平衡住房供需，并以此推动更有效率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具体为：

一是城市的住宅用地的供给数量应和户籍人口或参加社保人数等指标紧密挂钩，适度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倾斜。二是中央的转移支付适度向户籍人口数量增加较快的城市倾斜，以此鼓励城市向农民工开放户籍。中央还可设立专项基金鼓励兴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三是在增加热点城市住宅用地供应和征收房地产税的预期下，分阶段放松商品房和相关土地限价，限购限售政策也可小幅放松，鼓励向农民工和新毕业大学生出售二手房，并适度给其提供购房优惠和补助。四是中央要做好保障房建设用地的资金的分配。五是推进农村宅基地改革，使城市落户农民工有权自主处置农村宅基地，并允许其向落户城市转让复耕用地指标。

【来源：新浪意见领袖，作者：陆挺，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Top](#)

【共同富裕要超越分配 核心是破除社会身份体制】

“如何破除历史上长期城乡分治带来的二元结构，破除农民与市民、编制内与编制外、工人与干部等阻碍纵向流动的社会身份体制，是促进共同富裕最重要的途径。”近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接受采访，就共同富裕、宏观经济等话题分享了他的见解。

对于社会上流行的一种把共同富裕问题等同于分配问题的看法，刘尚希认为这是片面的，不能直接把分配视同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手段来看待。如果把重心过多的放在分配上，长期来看不可能真正地促进共同富裕，甚至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作为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差距并不是由分配本身带来的。

刘尚希还谈到，共同富裕既有“做大蛋糕”，也是“分蛋糕”；既有效率问题，也有公平问题。共同富裕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平衡效率和公平。我们要真正从物本转到人本的发展逻辑上，效率与公平才能从冲突变为融合。

对于四季度中国的经济表现和 2022 年政策展望，刘尚希认为，当前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外部环境、经济内生和政策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政府应通过调整宏观政策注入确定性，降低公共风险水平，稳定并引导预期，其中首要的是需要解决多部门、多目标、多政策的协调问题。正如共同富裕，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要放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背景下去考虑，放在城乡分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去考虑。

■ 采访实录

Q: 8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到了“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共同富裕到底怎么理解，是“杀富济贫”吗？是平均分配吗？

刘尚希: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把共同富裕问题等同于分配问题，我觉得恐怕不能简单地把两者划等号。分配其实是一个结果，共同富裕达到什么



样的状态，会呈现在分配的差距上、结构上。但不能把分配差距的调整视同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手段来看待。

共同富裕本身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富裕，也就是要“做大蛋糕”；另一个是共同，也就是“分蛋糕”。所以，共同富裕既有“做大蛋糕”，也有“分蛋糕”；既有效率问题，也有公平问题。这里还有一个发展的问题。所以，如果把共同富裕仅仅理解为一个分配问题是片面的，不仅会导致理解和认知上的偏差，也会导致政策上的偏差，可能会使得共同富裕过分依赖于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等手段去实现。

Q: 您经常提到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核心是对城乡二元分治等基础性制度进行改革，这方面您是如何考量的？

刘尚希: 共同富裕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基本社会权利的平等。而我们现实当中，就面临着人与人之间基本社会权利不平等的问题，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群体性差距。比如说农民与市民的身份体制造成的就业机会的不公平以及两者能力差距造成的起点的不公平，都是导致贫富差距较大的主要因素。

在历史上长期城乡分治的背景下，农村人口过去受户籍制度束缚，难以实现跨区域的自由流动，或者只能通过考学、参军两条主要路径去改变原有生存状况。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逐渐成为农村人寻求机会、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然而，这些人即便长期在城市务工生活，因受到社会身份的约束，仍难以平等享受到同城市民待遇。农民这个群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了外出务工的自由，但在二元社会结构下，难以举家迁徙到想去的城市，即便迁徙了也难以获得市民身份。近年来，我国通过各种政策和财政投入大大改善了农民户籍所在地的生产生活条件，消除了绝对贫困，解决了温饱问题，城乡融合发展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要实现农民的致富目标仍存在巨大挑战。在农村大力发展产业，往往没有城市的经济效率高。加上农民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劳动技能普遍偏低、子女教育缺乏平等机会等原因，导致农民致富和家庭条件改善比市民更难。这种社会身份体制除了户籍以外，还有体制内、体制外，编制内、编制外，工人身份、干部身份等等不同情形。当经济的不平等和社会身份的不平等之间一旦相互关联，甚至相互强化时，缓解群体性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设想，就会变得尤其困难。当公共服务不能被居民平等享受的时候，推进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需要构建新的发展观，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最重要的，通过人的能力、知识和创新，破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难题。要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就需要破除社会身份体制，提供优质、均等的公共服务。同时，这也可以缩小群体之间的差距，起点更加公平，机会更加均衡，发展的成果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共享。

所以，如何破除长期城乡分治带来的二元结构，包括经济二元结构、社会二元结构、以及所有制的二元结构（也就是农村集体和城市国有），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在这当中，摆在首位的应当是破除农民与市民、编制内与编制外、工人与干部等阻碍纵向流动的社会身份体制，这是促进共同富裕最重要的途径。

现在一谈到共同富裕，大家就谈分配，谈财政税收。但更重要的是，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征税，形成财政收入，再转变为财政支出去形成公共服务。通过公共服务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缩小群体之间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我原来提过“四个基本”：基本营养、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通过这“四个基本”破除原有的身份体制、城乡二元所造成的群体性之间的鸿沟，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

也就是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把共同富裕和人的现代化融合起来。在共



同富裕中促进人的现代化，也在促进人的现代化的过程中促进共同富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贫富差距，越来越接近共同富裕的目标。

Q: 目前国家打压“三座大山”——打击高房价、整治教培乱象、摀住无序扩张的资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途径吗？

刘尚希: “三座大山”的问题并不应当由政府单打独斗，而是应当结合社会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共同发挥作用。

比如医疗问题，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在可获得性方面发挥作用，尤其是对于低收入者的可获得性，通过医保来减小医疗服务获得方面的健康消费风险。比如住房问题，政府应当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通过给农民工提供廉租房、公租房，通过推进租购同权等手段，让农民工真正的市民化，为缩小贫富差距创造条件。这样的社会改革涉及如何平衡短期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如何平衡群体之间的利益、区域之间的利益、城乡之间的利益。这就涉及一系列的体制的改革，包括住房制度的改革、城市管理的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这些都要考虑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发展，尤其是要考虑如何促进弱势群体农民工的发展。只有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改革，才能真正促进共同富裕。

如果把重心过多的放在分配上，调高、提中、补低，这只能是短期的做法，长期来看不可能真正地促进共同富裕，甚至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如弱化勤劳创新致富的积极性。共同富裕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平衡效率和公平，不能让效率和公平变成翘翘板，否则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会不断变弱，会成为巨大的发展风险。发展是第一位的，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

Q: 必须在“分蛋糕”的同时也能“做大蛋糕”。

刘尚希: 分蛋糕不能影响“分配预期”，不能淡化努力、贡献与分配预期之间的关联性，否则蛋糕就难以做大了。现有的理论认为公平和效率是翘翘板，是无解的，认为扩大公平就必然有损效率，要提高效率可能就会有损公平，由此出现了“效率为主，兼顾公平”，或者是“公平为主，兼顾效率”。这两种说法都有偏颇。我们只要真正从物本转到人本的发展逻辑上，效率与公平就能融合统一起来，形成相互促进的局面。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普遍提升国民能力，尤其是农民的能力，缩小能力的群体性差距，鼓励勤劳致富，激励创造性劳动，提升知识价值，实现包容性发展，既能分好蛋糕，也能做大蛋糕。

Q: 美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也是全球慈善捐款最多的国家，“三次分配”，中国可以模仿美国的模式吗？

刘尚希: 捐款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只能说是一个补充。捐款很大程度依赖于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民道德水准的提升，而且这是一次性的。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一种社会机制，这要靠社会、市场、企业自发自觉的力量，提升社会自组织能力，发挥各种社会团体的作用，才能实实在在地帮助到中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当然，政府也要在这方面帮助创造条件，但不能靠政府单边推进。

Q: 所以还是说回不要把关注过多的放在三次分配上。

刘尚希: 不要只是分蛋糕，分蛋糕是一个零和游戏。必须共同做大蛋糕，这就要上升到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社会机制上来，把这个机制片面地理解为就是三次分配是不对的。这包括了三次分配，但是不限于三次分配，关键是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和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增强，通过诸如“社会企业”“互助保险”等公益性的社会组织来形成一种社会促进机制。社会的内在动力是首位的，相关的法律、政策要为此提供空间和条件。



Q: 关于宏观经济。市场对滞胀的担忧正在四起，社融、PMI 等多项经济数据在下滑，PPI 已经涨到了 10.7%。您怎么看待滞胀的风险？

刘尚希: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滞胀，而在于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包括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经济内生的不确定性、以及政策的不可预期性。公共风险水平上升，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利润减少，甚至亏损，因此产生了收缩、甚至退出市场等反应。企业一收缩，贷款需求不像以前那么旺盛了，社会融资的规模就会下滑。如果各个经济主体、社会主体都处于收缩的状态，那经济毫无疑问就会下行。

因此，政府要通过调整宏观政策注入确定性，降低公共风险水平，稳定预期，引导预期。首要的是，需要解决政府多部门、多目标、多政策的协调问题，包括促进共同富裕、绿色低碳、数据安全等多个目标如何协同，以防止带来公共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和“合成谬误”。降低政府自身带来的不确定性，是稳定预期的前提。除此以外，当今的很多经济问题受到非经济的因素影响，要把经济问题植入到整个社会体系中去考虑。在宏观政策方面，需要一体化地考虑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甚至各方面的公共政策。这就需要政策协同机制的创新。

比如共同富裕的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要放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背景下去考虑，放在城乡分治改革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去考虑。

Q: 具体来看，您如何展望四季度的中国经济表现？政策有哪些发力点？需要疏通哪些经济“堵点”？

刘尚希: 就具体的政策手段来说，当前，财政政策上应该适当扩大中央债务、提高中央债务占比，不要再进一步扩大地方债务或提高地方债务占比。这有利于从整体上控制债务风险。

这也意味着一些事权、支出责任要适当上移，让相应的财政政策手段（如赤字、债务等）更多地体现在中央层面。随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这个经济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性变得越来越强。在辖区外溢性、政策外溢性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适当上移事权和支出责任，既有利于避免宏观调控的微观化，也可防止中央调控的地方化。

【来源: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作者：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Top](#)



人物关注

毫无疑问，人是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那么，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中央高层的决策？哪些人会特别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这些人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倾向是什么？这些特征如何影响事态发展？他们怎样影响中央高层、怎样影响周边环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物分析将有助于揭开复杂事物的真相，从而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吴政隆当选江苏省委书记 惠建林、潘贤掌新任省委常委】

吴政隆当选江苏省委书记 惠建林、潘贤掌新任省委常委

11月27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第十四届委员会在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本届省委常委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

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差额选举产生了12名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们是：吴政隆、许昆林、张义珍（女）、王常松、邓修明、张爱军、费高云、韩立明（女）、赵世勇、惠建林、潘贤掌、曹路宝。

会议选举吴政隆同志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选举许昆林、张义珍同志为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此次换届选举产生的12人中，有三人为“70后”，他们是：费高云（1971年8月生）、潘贤掌（1972年9月生）、曹路宝（1971年9月生）。

惠建林、潘贤掌、曹路宝是江苏省委常委中的新面孔。惠建林、潘贤掌此前担任江苏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曹路宝此前担任盐城市委书记。

与此同时，杨岳、樊金龙、张黎鸿不再担任江苏省委常委职务。

杨岳，男，1968年7月生，此前担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

樊金龙，男，1963年11月生，此前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张黎鸿此前担任江苏省委常委、江苏省军区司令员。（据《江苏日报》）

玉苏甫江·麦麦提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杨发森不再担任

11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玉苏甫江·麦麦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会议决定：接受杨发森辞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职务的请求，报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备案。玉苏甫江·麦麦提，男，维吾尔族，1968年10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曾任地州市党委工作部门副职，县委副书记、县长，自治区副厅级单位正职、政府组成部门副职、正职，副省级城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据《新疆日报》）

孙守刚任河南省副省长 周霁、王战营、陈星不再担任

2021年11月27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孙守刚同志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决定免去周霁、王战营、陈星同志的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官方履历显示，孙守刚1965年8月生，山东利



津人，198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7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他曾长期任职于共青团山东省委，1997年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2002年任山东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2006年任济宁市委书记。2010年，孙守刚任山东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17年11月首次跨省履新，任河南省省委常委，次月同时任统战部部长，后兼任省政协党组副书记。

此番卸任河南省副省长的周霁，去年年底由湖北省委常委、宜昌市委书记调任河南省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后任常务副省长。今年10月29日，他当选为河南省委副书记，后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

卸任河南省副省长的王战营，曾任商丘市委书记等职，去年7月任河南省副省长。今年10月29日，他当选为河南省省委常委，后兼任省委宣传部部长。

卸任河南省副省长的陈星，曾任驻马店市委书记等职，今年5月任河南省副省长，10月29日当选为河南省省委常委。（据《河南日报》）

易炼红当选江西省委书记 任珠峰、张鸿星、鲍泽敏等5人新任省委常委

11月26日，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十五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江西省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易炼红、叶建春、吴忠琼、梁桂、马森述、吴浩、李红军、任珠峰、张鸿星、庄兆林、鲍泽敏、史文斌、黄喜忠；选举易炼红为省委书记，叶建春、吴忠琼为省委副书记。易炼红，男，汉族，1959年9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据《江西日报》）

江西新一届纪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名单(书记马森述)

中共江西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共江西省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26日下午在南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省纪委委员45人。受省第十五次党代会主席团的委托，马森述主持会议。全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共江西省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并经省委十五届一次全会通过。马森述、魏晓奎、许朝杰、范小林、王仁辉、饶利萍、庄国良、郑志军、王爱东、包静、严正当选为中共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马森述当选为书记，魏晓奎、许朝杰、范小林、王仁辉当选为副书记。马森述，男，汉族，1965年10月生，山东乳山人，1987年7月参加工作，199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现任江西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员会主任。（据《江西日报》）

谈绪祥任北京市副市长

正在召开的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决定：任命谈绪祥为北京市政府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到会就提请的任免议案作说明。经表决，任命通过。简历显示，谈绪祥1966年5月生，汉族，安徽芜湖人，2004年11月入党，1989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毕业(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曾任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大兴区等单位。2011年，谈绪祥任大兴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2013年任大兴区区长，兼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副书记。2016年，他任大兴区委书记、北京市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2017年5月，谈绪祥任北京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至今。（据《北京日报》）

刘奇凡任辽宁省监委代主任 廖建宇辞去主任职务

2021年11月26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任命刘奇凡为辽宁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廖建宇辞去辽宁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2021年11月26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鉴于中央已决定



廖建宇不再担任辽宁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接受廖建宇辞去辽宁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

刘奇凡，男，汉族，1967年4月生，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学位。现任辽宁省委委员、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曾任贵州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贵州省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副处长、处长，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贵州省委副秘书长，贵州省铜仁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秘书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纪委书记、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据《辽宁日报》）

张吉福任山西省副省长 吴伟、卢东亮、韦韬不再担任

据《山西日报》，11月25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决定任命：张吉福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决定免去：吴伟、卢东亮、韦韬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官方履历显示，张吉福1964年9月生，天津人，1989年9月参加工作，198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据《山西日报》）

王东伟任河南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

据河南省委统战部官方网站“领导信息”栏目近日进行更新，据最新名单显示，王东伟已任河南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王东伟，1969年9月生，曾任河南省财政厅厅长，信阳市委书记等职，近日当选为河南省委常委。（据《河南日报》）

柯俊任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

11月22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柯俊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调研。上述报道显示，新任河北省委常委柯俊，已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柯俊，男，汉族，1965年8月出生，曾长期在湖北省工作，2021年2月起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近日调任河北省委常委。原任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廉毅敏，今年9月已任河北省委副书记。（据《河北日报》）

刘昌林任河北省监委代理主任 刘爽辞去主任职务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接受刘爽辞去河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备案。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任命刘昌林为河北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代理主任。（据《河北日报》）

[Top](#)



智囊高参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在中南海内外，活跃着一个特殊的幕僚群体，他们为中央高层出谋划策，并有意无意地向外界释放思想、建议、政策措施等相关信息。关注他们的观点、建议和动向，就好像“更上一层楼”，可“穷千里目”。

【刘世锦：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

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难处何在？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之所以重要，首先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相关。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3 年在题为《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的报告中指出，在 1960 年的 101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 2008 年只有 13 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87% 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将近 50 年的时间里，都无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甚多，其中一个重要变量就是收入差距过大，没有形成足够规模且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反之，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都保持了较小的收入差距。

就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的跨越期来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意义首先是增加消费需求，对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的动能。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已由高速转入中速，投资、出口对增长的重要性下降，消费和服务业逐步转为主导性增长力量。中等收入群体作为边际消费倾向高（相对于高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强的部分，成为扩大消费容量进而拉动增长非常重要的力量。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扩容，前提是能够实现收入增长，使这部分人由低收入行列中脱颖而出。有论者谈论如何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似乎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低是由于他们不愿意消费，这并不符合实际，其主要限制因素仍然是收入水平低。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可以有多种途径，比如通过再分配，但在总体和长期层面，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并进入中等收入行列，要靠他们自身创造财富能力的提升。所以，在增长视角下，对有潜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那部分来说，他们不仅是消费者，更重要的应当是生产者、创新者，在这几种身份之间建立起可持续的循环。他们首先是生产者、创新者，创造出社会财富、提高收入水平，进而增加消费，并为下一轮生产和创新营造条件。

这种循环的形成和提升并非易事，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难处正在于此。较低收入人群，或潜在的中等收入人群，对既有发展空间和制度条件的分享可能性显然是偏低的，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要跻身中等收入群体，就要打破既有的多个层面的约束，形成一组新的发展空间和制度条件。



二、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的意义和重点人群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进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第二阶段。但第二阶段的难度和不确定性都要大于第一阶段。试图后富起来的群体在人力资本、发展机会和发展条件上总体落后于先富起来的群体，而且向前走或向后退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已有先例。从国内看，前段时间受疫情冲击，部分地区的劳动者收入和消费水平下降，有数据显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出现阶段性收缩。

在这个时间节点，有必要提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在已有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上，再用10~15年的时间，推动这个群体增加4亿~5亿人，达到8亿~9亿人，占总人口的60%左右。提出并实施这一目标可以有如下一些考虑。首先，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对扩大内需、提高生产率和社会政治稳定都是不可替代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实现倍增的时间都具有重要意义。规模不足或时间拖后都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和稳定性。对此缺少认识很可能付出全局性代价。其次，提出目标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有利于形成全社会共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这正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所在。

实现这一目标具有可行性。根据我们研究团队的测算，假定2019—2030年实际GDP平均增长5.0%左右，平均通胀率为2.5%，名义GDP年均增幅7.5%，居民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匹配。同时根据不同收入群体内城乡居民分布的加权计算，低、中和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速分别为7.7%、7.1%和6.9%，到2030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上升至约51%，低收入群体比重下降至约45.6%，高收入群体比重则上升至约3.3%。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达7.5亿人，与2018年相比有3.7亿人由低收入群体上升至中等收入群体。按照大体相同的变动速度，到2035年以前，有可能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达到8亿~9亿人，实现倍增的目标。

另一个相关议题是实现这一目标涉及的重点人群。从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看，到2030年有可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3.7亿人，主要对应的是2018年家庭年收入介于4万~6万元、6万~8万元和8万~10万元的低收入家庭，也就是我们需要重点分析的潜在中等收入群体。这个群体中城镇居民占比为57%，乡村居民占比为31%，外来务工人员占比为11%。其中外来务工群体，从数量和定义上，更接近进城农民工群体。农民工是指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87亿人，外出农民工1.72亿人，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7亿人。外来务工群体的定义为“来自农村地区、户口不在本城镇社区的人员”，2018年外来务工群体占比为9.7%，人口数量在1.35亿人左右。从数量上看，外来务工群体大体接近进城农民工。

与2013年相比，2018年外来务工人员中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的部分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2%提升至4.1%，占中等收入群体增量的27%，贡献率相当可观。这里说的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属于劳动年龄人口，非就业人口不多。而在乡村居民中，相当多的人口属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和父母，其收入状况直接依赖于外来务工人员。此外，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的比重逐步提高，相当多的农民是在户籍所在地“被城镇化”的。所以，处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人口规模明显要大于上述外来务工人员。从现阶段我国城乡结构转型、收入增长的特征看，广义上的“进城农民工”是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着力关注的重点人群。



从调查数据看，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的进城农民工家庭平均支出强度显著高于农村家庭，但由于无法同等享受城镇户口的相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其储蓄避险意愿较高，使外来务工家庭平均消费强度与城镇家庭仍有很大差距；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基本接近城镇居民水平；就业分布与城镇居民有明显差异，外卖、出租车和快递等新型就业场景吸纳了数量可观的“新型农民工”就业，外来务工人员以 10%的人口占比贡献了 20%的新型就业，远超城镇和乡村居民；更多就职于民营部门，机关企事业单位就业占比较低，面临收入不高、就业不稳、社保不全等一系列制约其收入和消费稳定增长的因素；无法享受完善的城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医保和养老保险覆盖率明显低于同样居住在城镇的居民；相当一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其中的较高收入者，有明确定居城镇的需求。应当从进城农民工的这些特点出发，采取针对性强、务实有效的战略和政策，推动更多的进城农民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三、实施以提升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倍增战略

进入共同富裕的第二阶段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和政策的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着力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以增效带动增长的方式缩小收入差距。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在剥去种种社会关系的外衣后，人们之间能力的差距，远没有现实世界中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差距那么大。如果能够创造一个人力资本公平发展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积极性、创造力普遍而充分地发挥出来，公平和效率就可以互为因果，在提升社会公平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依照这种思路，下一步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应以提升进城农民工人力资本为重点，采取多方面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力争在不长时间内取得明显成效。

一、对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落户实行负面清单制度。目前中小城市和部分省会城市已取消落户限制，对仍有限制的城市改为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即由规定符合何种条件能够落户，改为不符合何种条件不能落户。积极创造条件，加快缩减负面清单。对北上广深和其他特大型城市的城市核心区与非核心区域、都市圈内的中小城镇等实行差异化政策，采取不同的负面清单，适当放宽后者的落户限制。

二、建设面向农民工为主的安居房工程。以大城市尤其是几大都市圈、城市群为重点建设安居房，着力解决能够稳定就业、对当地发展做出贡献、就地缴纳社保的低收入农民工住有所居、安居乐业的问题。以 40~60 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降低建造成本，把安居房价格控制在与农民工购买力相适应的水平。降低购买资格门槛，不歧视无户籍、无学历人口。由政府主导筹措土地资源、设计运行规则、加强监管，在政策框架内实行市场化运营，形成商业可持续机制。

三、与农村人口进城落户、提供安居房相配套，加快推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继续推进并扩展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随人员流动可携带的政策，打通农村社保、医保和城镇居民社保、医保的衔接。实行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政策。

四、提供就业基本公共服务，鼓励吸收农民工就业。对有劳动能力和就业需求的进城农民工，持居住证可在常住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享受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全面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逐步将职业教育培训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



加以提供。推行农民工新型工匠培训计划。鼓励各类技工院校、职业学校、就业训练中心等参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对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并在财税、信贷等方面有必要的激励措施。国家对吸收农民工就业、安居较多的城市，在财政补助、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给予相应支持。

五、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增加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组织外部流转。积极稳妥务实地解决好小产权房问题。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获取的收入，应优先用于完善相应地区农村人口的社保体系，使他们与城里人一样不再依赖于土地保障，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收入的同时，由更为有效和稳定的社会安全网托底。

六、促进机会公平。进一步打破不当行政性管制，疏通社会流动渠道，防止社会群体固化。改变有些地方对低收入农民工的歧视性做法，在大体相当条件下，在就业、升学、晋升等方面，给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可及机会。

七、各级政府要制定规划、完善政策、定期督查、确保落实。要将农民工落户、住房、基本公共服务、就业和职业培训等纳入“十四五”规划和年度规划，明确有关部门的任务和职责，定期检查落实情况，做出进度评估，向各级人大报告。同时要根据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和就业状况变化，对相关规划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改进。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创新，并将好的经验和做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来源：爱思想网，作者：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Top](#)

【刘元春：中国房地产短期稳定与中期改革必须并行推进】

一、中国房地产新时代已来，长期改革势在必行，短期稳定需靠政府发力

首先要超越传统的短周期和长周期的视角，一定要认识到中国房地产新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新时代超越了短期行政管控所带来的短期波动，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人口变化和库存周期变化所带来的周期性波动。中国未来整个房地产的基础运行机制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一是由于土地财政走到尽头，城市土地的供应模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基于中国土地的二元体系，构建了以地兴市，以地兴企，以土地作为杠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金融化的模式，促进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形成。但是目前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末端，它所产生的收益在下降、成本在急剧上升。中国要进入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纠正过去的这种内生推动体系，目前国家已经开始试点改革城市建设用地的形成机制和城市租赁房的土地供应机制。地方发展和地方竞赛的模式也将发生巨大变化。

二是国家出台了大量“房住不炒”的政策措施，特别是房地产税全面试点的推出宣告房地产的存量调整时代已经到来，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将收缩到有限的范围。以土地为杠杆的金融扩张过程要发生拐点性变化，中国金融深化的逻辑将作出调整。

三是房地产供应模式将从过去 20 多年的“单一市场轨”转向“市场-政府双轨并行”。不仅稳房价、稳地价和稳预期的机制，同时房地产绑架短期宏观经济



政策的模式也将发生改变。不仅中国人口增速、转移性人口增速以及城镇化速度的放缓将大大降低商品房的需求，存量调整以及政府给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保障性住房也将大大改变房地产商传统盈利模式。这种体制的变化决定了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种新的时期的转换就决定了我们不能用传统库存周期或者库兹涅茨周期，或者短期宏观稳定的行政调控周期来解释最近的房地产的变化。

其次，未来房地产大改革的序幕全面拉开，导致目前这一轮房地产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趋势性变化，而不是短期波动。因此在这种趋势性的变化中，就要把市场预期、企业行为、政府行为把握清楚。我们需要判断政府管控能不能对市场主体的预期以及对于中长期改革程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如果不行，在短期稳市场的举措上就要有新思路，而不是在传统思路上面打转。

再次，目前支撑市场的力量不足以稳定当前整个宏观经济，因此需要通过政府轨进行发力。以前应对房地产市场的大调整都是政府轨通过各种政策来进行支撑，但政府轨的支撑力量以往都是用于去库存，降成本等措施扶持房地产商稳定宏观。而这种行政管控放松、政府扶持最后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越控制越涨价，房地产资产负债率以及房价朝着我们非既定的方向调整。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走出过去的调控与高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怪圈。因此这一轮我们完全可以抛弃这样的一种调控模式。当前很重要是政府轨的力量要纠正房地产市场自身在定价、在资源配置和自身企业发展上的一些不足，要行使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其中很重要的发力点就是新型城镇化，要为城市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提供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共有产权房，同时在短期投资和中期消费上给予整个宏观上的支持。因此，我们认为政府轨以及租赁市场在未来五年的构建是短期支撑房地产市场和宏观稳定的重要力量，也是支持长效机制改革一个重要辅助手段。过去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设难以持续的改进，一大原因就是房地产在整个宏观的支柱地位所带来的影响太强烈。因此，房地产绑架宏观经济，从而绑架我们改革的模式一定要解套。

最后，最近美联储所出具的关于中国金融风险的警示，以及罗格夫最近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报告引起了国际市场的关注，认为恒大事件会引发中国整体宏观以及世界金融的变化。我认为这种观点过度夸大了中国当前的状况，因为目前房地产占 GDP 的比重和对 GDP 的影响还没有达到欧美最高的水平。同时中国围绕着房地产市场所做的杠杆虽然很高，但中国相应的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很少，更为重要的支撑是大量的自住需求。所以，我认为美联储和罗格夫的研究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机制还不是很了解，对于中国下一轮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举措也不是很清楚，而仅是从一些数据进行的简单的外推。2008 年后研究中国房地产的国外报告有很多种，他们都会得出中国房地产市场会崩溃的结论，但事实上并未崩溃。我们可以关注国外的观点，但我们也要旗帜鲜明地对这些观点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发表我们的看法。我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对于恒大事件的处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同时恒大事件对于房地产的预期调整有很大的影响，但事实上这些调整是我们本身政策目标的一环。当然我们在降杠杆的方法上应该更加审慎，特别对于目前这种高债务、高还本付息率的运行状态，对流动性的管理方式需要更高的艺术和更好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采取行政管控。这样就可以避免过度系统性的传导机制，从而按照既定方法、管控模式和体系，使中国经济在未来调整中更为平稳。

当然，近期房地产市场趋势性回落已经形成，短期内难以进行扭转，并且我



们也不希望恢复到过去那种短期、周期性变动模式之中。当前我们要推行基础性改革和短期稳定相并行的一种模式来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需要“三大类举措并用”并保持中长期改革定力

我们一定要明确在房地产市场未来的中长期目标到底是什么，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要在长效机制上破题。所以，我建议不仅仅是两只手都要动，并且还要有第三只手。一是中长期的改革和长效机制的变化要坚定不移的推进，不要因为暂时性的波动而立刻停止。二是在短期宏观稳定、防止系统性风险上一定要加大力度。因为去杠杆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行为，永远比加杠杆所带来的风险要强劲得多。因此，要把风险防范放在一个战略高度，它和改革推进是并行的两条线，但不意味着是捆绑的两条线，千万不能为了短期稳定来绑架改革进程。三是政府发挥短期稳定的作用要遵循供求规律，特别是短期和中长期的供求规律。政府的功能不是简单地约束市场和放宽市场，而是政府在一系列具有公共品属性的房地产上面有所作为，全力配合新型城镇化，全力配合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倍增计划，给他们提供充裕的租赁服务和低端住房的供给。这样能够维持消费投资的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时弥补当前一些财政和相关项目渗透性比较差的缺陷。

【来源：新浪意见领袖，作者：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Top](#)

虎视寰球

全球化加剧外部冲击的力度，既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又使全球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平衡，并导致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和社会等等全方位的矛盾和冲突。如何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化弊为利？从决策的角度，不仅中央高层在殚精竭虑，那些有志于在全球化中冲破重围的企业家和改革家更是殚精竭力。那么，双方如何互动？本栏目力求更多的向大家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启发。

【德国“红绿灯”新内阁来了】

谈了两个月，德国新政府终于有眉目了，三党组阁难点不少，但也是不得不。四分五裂的民意之下，“红绿灯组合”是注定的了。从执政纲领来看，新政府看起来雄心勃勃，特别是基建投入和减碳规划。不过，在那之前，新政府面临的头号难题仍然是疫情，眼下，德国的疫情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

■组阁成定局

德国政坛的“红绿灯组合”要上线了。当地时间 11 月 24 日，德国社会民主



党（代表色为红色）与绿党（代表色为绿色）、自由民主党（代表色为黄色）领导人一同出席新闻发布会，宣布三大党派就组建联合政府达成协议。

10月15日，德国大选结果正式出炉，最终计票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社民党）获得25.7%的选票，成为联邦议院第一大党；联盟党得票率为24.1%，绿党得票率为14.8%，自由民主党（自民党）得票率为11.5%，当天，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发表声明，宣布已达成联合组阁的初步共识。10月下旬，三党正式进入实质性组阁谈判。谈判总是有波折的，三党在气候、税收、财政等政策上存在分歧，而且在财政部长等内阁职位的分配上发生争执。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指出，东西德统一以来，德国没有出现过三党联合执政的情况，尽管战后曾有过。整体来看，相较于上届政府组阁过程，最后联盟党和社民党组阁，这次组阁还算是比较顺利的，没有出现过很严重的不和谐和反复。尽管这三个党都有各自的想法，但都想执政，也认为国家亦需要新政府尽快到位。

不过，丁纯也坦言，毕竟是两个中左翼的政党和一个中右翼的政党，在一些理念、政策上还是很不一样的，包括绿色、税收、财政、民生和经济等问题，互相之间肯定少不了讨价还价，另外，部长职位的分配上也是各自关心的重点。根据组阁协议，德国政府将设置17个部门，比目前的看守政府多一个。社民党将获得7个部长职位，包括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卫生部长以及新成立的建筑与住房部长等。绿党将执掌6个部门，包括外交部、扩大后的经济与气候部等。自民党将领导4个部门，包括财政部、司法部等。接下来，三个政党还需就该联合执政协议各自进行批准，这一过程于日前开始，为期10天。组阁成功后，德国16年的“默克尔时代”将正式落幕。外界普遍认为，至此，朔尔茨已扫清了就任总理的最大障碍。作为社民党总理候选人、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奥拉夫·朔尔茨有望在12月6日开始的那周内成为新一任德国总理。

■朔尔茨其人

作为默克尔的接班人，朔尔茨的确也有着“默克尔式”的低调实用主义。冷静、沉稳是朔尔茨给外界留下的印象，汉堡《时代周报》曾给了他一个至今还在流传的外号——朔尔茨号机器人（Scholzomat）。虽然只比默克尔小了四岁，但朔尔茨的运气不如前者，从政之路开始得早，却没能遇上科尔那样的伯乐。1958年，朔尔茨出生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17岁时，高中生朔尔茨就加入了社民党。之后，朔尔茨成为联邦议员，并在社民党的政坛浮沉中往返于柏林和汉堡，在施罗德担任总理期间就已是社民党重量级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朔尔茨政绩突出，特别是在稳定房地产市场领域。2011-2018年间，朔尔茨一直稳坐汉堡市长的宝座。2018年，基民盟与社民党组阁，作为代理党主席，朔尔茨出任德国副总理和联邦财政部长。

事实上，在此次大选时，朔尔茨最初并不被看好，但冷静应对危机的形象，给他加了不少分。疫情期间，作为财政部长的朔尔茨，推动出台了德国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计划，并两次追加财政预算，把失业率控制在较低水平；而在洪灾来袭时，朔尔茨也迅速主导出台赈灾方案。几次对危机的从容应对，令朔尔茨收获了不少民心，甚至带动了大选时社民党的支持率上涨。早在提名朔尔茨为总理候选人时，社民党党主席之一萨斯基亚·埃斯肯表示：“我们想要找到一个既有务实的政府领导经验，又有过硬的危机处理能力和前瞻眼光的候选人。”社民党另一位党主席瓦尔特·博尔扬斯也表示，朔尔茨不仅拥有坚实的民众基础，还是一位成功的危机处理专家，而危机处理能力是担任德国联邦总理所需的最重要能力之一。



■两大任务

在组阁后的发布会上，朔尔茨给出了新政府的两大首要任务：应对重新抬头的疫情，以及开展一波基建投资，在升级这个工业经济体的同时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朔尔茨明确表示，执政联盟一致认为，接下来将会是“（基建）投资的十年”。具体而言，新的执政纲领中，与低碳经济有关的项目占了绝对大头，这也是执政联盟中绿党最看重的领域。执政联盟承诺，德国将致力于在 2045 年实现碳中和。新政府计划在 2030 年关闭所有煤电厂，同时 80% 的能源需求使用可再生能源满足，这一目标也比默克尔政府此前给出的 2038 年大幅提前。

对于绿色发展的话题，丁纯谈到，气候变化一直是整个欧洲关注的重点，大氛围之下，德国也不例外，特别是此次绿党上台，无疑会更加重视。而在不少德国人看来，默克尔在执政期间对于气候变化做得还不够，所以需要补课。包括可再生能源发展、推广新能源车等成为关注点。的确，除了明确大的方向，在一些细节上，三党也给出了具体的规定，比如在交通方面，三党计划从 2035 年起停止销售内燃机汽车，而绿党原来提出的最终期限是 2030 年；另外，三党还将继续完善气候保护法，并将在新政府中引入“气候检查”机制；到 2030 年，计划届时德国市场保有的电动车达到至少 1500 万辆。

除了绿色发展，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数字和服务部门主管马克·霍尔认为，商业界可以期待新政府对数字化的大力推动，比如 5G、高速互联网和移动电话服务的全面延伸，以及对高度创新和可持续的数字商业模式的新激励和融资计划等。丁纯表示，现在德国也意识到在基建、数字等领域的发展上有很多不足，尤其与中美等国相比，需要有更多更具体的谋划。

丁纯指出，联合政府内部来看，三方还是有需要磨合的地方，比如社民党主张提高工资标准，绿党想在绿色问题上做文章，自民党又强调财政纪律，这就涉及到对支出和收入的财政预算的平衡，都是三党要解决的问题。另外，外部来看，德国也需要处理好与美国、法国、欧盟、中国及俄罗斯等的关系。

“现在，对于德国来说，首先还是要控制住疫情，然后实现经济的有序复苏，在数字、绿色方面需要加速转型。”丁纯坦言。眼下，德国疫情日益严峻，德国联邦疾控机构发布的最新疫情数据显示，德国 11 月 25 日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75961 例，累计确诊 5573756 例。在此背景下，德国看守内阁总理默克尔打算启动全德“封锁”措施，为期两周至 12 月 8 日。这一点，新内阁也考虑到了。朔尔茨当天宣布，下届联邦政府将建立一个由联邦和各州共同参与的新冠疫情危机应对小组，并将由总理府每日发布疫情形势报告。（据《北京商报》）

[Top](#)

【杀油价 拜登终于亲自动手了】

在多番要求 OPEC+ 增产失败后，美国总统拜登转头联合原油消费大国联合抛储，以期缓解由于供需不匹配而居高不下的油价。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与油价一同走高的通胀不是靠抛储就能缓解的，仅够全美使用 2 天半的数量也受到多方质疑。市场的反应已经很诚实，油价不跌反涨，布伦特油还重回 80 美元/桶上方。

■多国释放石油储备

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略石油储备释放来了。当地时间 23 日，美国白宫宣布，美国能源部将从战略石油储备（SPR）中释放 5000 万桶原油，以缓



解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时出现的石油供需不匹配问题并降低油价。

美国能源部表示,这 5000 万桶原油最早将于今年 12 月中下旬开始投放市场,其中 1800 万桶已得到国会批准将直接销售,另外 3200 万桶属于短期交换,待油价平稳后约定于 2022-2024 年归还战略石油储备。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截至 11 月 19 日,战略石油储备总共可以容纳 7.27 亿桶,目前持有 6.045 亿桶,分布在国内的四个地点,石油将在白宫宣布后的 13 天进入市场。

在美国之后,印度政府宣布,将释放 500 万桶战略石油储备。英国政府发言人也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英国将允许私人持有的石油储备自愿释放。此外,日本政府 24 日宣布,将配合美国为平抑油价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行动,在不违反石油储备法的前提下释放国家过剩石油储备。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前东日本大地震及利比亚危机爆发时日本释放民间石油储备不同,这是日本首次为了抑制油价上涨而释放国家石油储备。

根据日本的石油储备法,石油储备并非稳定油价的工具,不允许因价格高企就释放储备,只能在供应面临中断或发生灾害时释放石油储备。不过,目前政府和私营部门持有的储备量都超过了法定最低要求。释放过剩储备不受法律限制。

韩国也做出了行动。韩国政府宣布,将与日本、印度等主要石油消费国一道参与美国提议的共同释放储备原油计划。韩联社报道称,韩方具体石油释放规模、时间和方式等将在日后公布,预计释放规模将与此前韩国和国际能源机构(IEA)之间的国际合作事例相持平。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全球大宗商品战略负责人赫利玛·克罗夫特预计,鉴于印度已经宣布计划释放 500 万桶原油储备,再加上日本、韩国、英国等国的释放量,此次多国联合释放的原油储备规模预计为 6500 万-7000 万桶。

■被通胀逼到墙角

对许多美国老百姓而言,这的确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空气里弥漫着“通胀的味道”。而作为“车轮上的国家”,汽油对美国的经济格外重要。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11 月 22 日美国全国平均汽油的价格为每加仑 3.409 美元,远高于一年前的 2.11 美元。白宫的公报称,美国消费者正在感受到加油站和家庭取暖费用上涨的影响,美国企业也是如此,因为随着全球经济逐步摆脱疫情困扰,石油供应跟不上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总统正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工具来降低油价,解决供应不足的问题。在油价居高不下的背后,是美国高烧不退的通胀。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拜登正遭受着他“几乎无法控制的通胀问题的折磨”,而且其威胁越来越大。10 月,美国的通胀率达到 30 多年来的最高值。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孙立鹏指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无法解决目前的通胀问题。但是,由于拜登手头的工具没几个,因此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是一个比较容易的选项。也有人觉得,光是释放石油储备还不够。22 日,12 名民主党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拜登,敦促他除了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还要用“禁止美国原油出口”来应对高油价:“禁止美国原油出口将增加国内供应,为了让美国家庭用得起汽油,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手段在短期内降低汽油价格。”“全球在石油储备方面的协调行动将有助于解决供应不足的问题,行动不会在一夜之间解决问题,但会产生影响。战略石油储备的释放将提供我们所需的原油供应,我们将度过这次汽油价格的高峰,希望比过去更快”。在演讲时,拜登信誓旦旦地做出承诺。随后,他启程前往马萨诸塞州的南塔克特岛,在那里度过感恩节假期。

■杯水车薪?



彭博社称，这将是主要石油消费国“史无前例”地联手遏制油价飙升。但事与愿违，国际油价当日不跌反涨。截至 23 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2022 年 1 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75 美元，收于每桶 78.50 美元，涨幅为 2.28%。2022 年 1 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上涨了 2.61 美元，收于每桶 82.31 美元，涨幅为 3.27%。市场人士认为，释放原油储备难以对油价产生持续影响，国际油价在此前几个交易日出现的显著下跌反映市场提前消化这一消息，而且当日美国公布的具体措施力度不及市场预期。

美国合众银行财富管理投资策略师罗伯·霍沃思表示，美国释放原油储备的总规模高于此前市场预期，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短期交换，需要返还，这在一定程度上令这一政策的影响打了折扣。英国石油巨头 BP 则指出，美国 2020 年的日均石油消费量为 1717 万桶，由此可计算出释放量不够消费 3 天。而仅从 OPEC+ 中参与减产的国家来看，今年 12 月的生产计划就达到一天约 4000 万桶。即使释放储备，大部分供应依赖于产油国的结构没有变化。

另一方面，拜登显然动了欧佩克等产油国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奶酪”，“石油扑克游戏的赌注在加大。”美国《财富》杂志说，这可能给华盛顿的中东外交带来新的紧张。有相关人士指出，如果释放储备，OPEC+ 有可能减产。而减产带来的涨价压力或许会大于美国等释放储备带来的降价因素，前景并不透明。

美国价格期货集团高级市场分析师菲尔·弗林也认为，释放原油储备只会对油价带来短期冲击，后期疫情走势和产油国对释放原油储备是否做出政策反应将决定油价的下一步走向。中石油工程院高级工程师纪国栋则表示，多国释放石油储备短期为平抑油价，但长期来看，疫情后全球经济秩序恢复，需求仍然十分旺盛，加之美国刺激经济及各种地缘政治因素，油价依然看涨。在需求方面，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美国航空客运数据依然强劲。据美国运输安全局估计，感恩节假期期间全美将有大约 2000 万游客乘坐飞机出行。安全局称，11 月 19-28 日期间，美国各地机场都会非常繁忙，预计客流量可能会接近疫情前水平。（据《北京商报》）

[Top](#)

【美继续制裁“北溪 2 号” 欧洲今冬天然气供应难上加难】

据俄罗斯媒体 11 月 24 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美国将继续针对“北溪 2 号”管道项目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此前还宣布，对参与“北溪 2 号”管道项目的两艘船只和一家公司实施制裁。俄驻美大使抨击称新制裁不可接受。近日，德国网络管理局宣布暂停对“北溪 2 号”运营认证的审批工作，理由是该管线的运营企业必须符合德国的法律规定。目前负责“北溪 2 号”运营的“北溪 2 号集团”所在地为瑞士，是俄罗斯天然气集团 Gazprom 的全资子公司。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俄罗斯天然气集团需要在德国境内成立一个全资子公司，并将瑞士子公司的资产及人员转移至德国，方能满足相关要求。

受这一消息影响，欧洲天然气市场随即出现波动。荷兰天然气期货市场价格立刻上涨 10%。市场分析人士警告称，受目前该项目进展受阻的影响，不仅天然气市场将出现波动，国际原油价格也将受到影响。专家指出，“北溪 2 号”项目运营认证审批暂停，极有可能使俄罗斯此前做出的在“北溪 2 号”运营后即提高对欧供气量的承诺无法兑现。分析认为，尽管“北溪 2 号”本身投入运营与否对欧洲今冬天然气供应产生的影响有限，但人们对于俄罗斯是否会以此为条件把控



对欧总体供气量的担忧，将该项目的前途命运与欧洲今冬能源供应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前欧洲对俄罗斯试图利用能源紧缺在“北溪2号”项目审批上施压的担忧正在不断增加。特别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北溪2号”贯通运营后，俄罗斯对欧输气量将大幅增加。这一表态似乎是在暗示，欧盟要想得到更多天然气供应，就应当尽快批准“北溪2号”项目。

“北溪2号”运营认证审批受阻，对本已面临严重危机的欧洲能源市场而言可谓雪上加霜。普通消费者将承担相应的价格上涨。根据德国比价网站 Check24 的最新数据，德国已有 439 家天然气供应商进行提价，平均价格较往年增长 24.6%。这意味着，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能源开支将增加 369 欧元。此前欧洲天然气价格已经持续上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对德国及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工业生产及居民能源消费均已产生严重影响。

目前各方对何时重新启动审批工作均未明确表态。德国网络管理局表示，只有相关企业成立合规的下属企业并将管线所有权及运营权完整移交，相关的审批工作才会恢复。根据原计划，该审批流程将于明年 1 月 10 日结束。而在目前的状态下，该流程将一直延期至相关工作彻底结束。参与谈判的各方预计，该流程可能会拖延数月之久。

鉴于欧盟层面对该项目的反对态度一直存在，项目在审批过程中得到欧委会支持的可能性不大。欧盟方面目前表态称，该项目并不符合欧盟的总体利益，因此该项目的审批工作必须高度透明且合规。同时欧盟还表示，将会从严审理德国网络管理局的审批决定。这一过程在欧盟层面有可能持续 4 个月。根据业内人士分析，“北溪2号”项目运营认证审批工作极有可能将拖延至明年夏季。

根据德国网络管理局的消息，目前相关企业正在按照德国有关部门的要求进行合规操作。德国相关部门的决定得到了该项目反对者的支持。欧洲议会绿党议员拉格丁斯基认为，德国网络管理局很好地贯彻执行了德国和欧盟的法律法规。管网建设与运营企业必须有效分离，并确保建设方不能通过建立皮包公司等方式欺骗主管机关。

“北溪2号”项目以其能源和地缘政治属性，早已成为俄美欧各方关注的地缘政治热点。就连德国内各党派之间对该项目的态度也大相径庭。即将参与执政的德国绿党坚决反对该项目，而其潜在执政伙伴社民党则对“北溪2号”项目予以支持。这一问题也成为两党在执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最重要的意见分歧。

欧盟各成员之间也就该项目的进展表示出不同程度的担忧。近日，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要求德国放弃“北溪2号”项目。他表示将会与即将出任德国总理的朔尔茨就此进行沟通。莫拉维茨基表示，欧洲应当携手维护和平，而不是通过进口天然气使俄罗斯获得用于扩充军备的巨额收入。波兰对“北溪2号”项目一直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莫拉维茨基本人也一直致力于说服欧盟及其成员国放弃该项目，以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美国方面也试图对“北溪2号”项目施加更大压力。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会晤时表示，美国将密切关注俄罗斯是否将能源供应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并利用欧洲正在经历的能源危机获利。布林肯还表示，如果俄罗斯试图将能源作为武器或者继续利用能源问题对乌克兰采取过激行动，那么美德两国都有义务适当采取应对措施。这一立场正好是今年 6 月德美就“北溪2号”项目达成协议的重要基础性共识。尽管美方始终认为，俄罗斯将能源供应作为武器向乌施压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德国方面并不希望在此问题上过早表明立场。德国政府目前仍表态认为，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俄罗斯在利用能源供应作为



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分析普遍认为，鉴于当前在能源和经济领域面临的困境，德国无意在此时激化与俄罗斯的矛盾。（据《光明日报》）

[Top](#)

华夏透视

善于学习的人懂得把观察、经验和知识转化为智能并使用得当，不仅能把梦想持之以恒，更懂得如何事半功倍。投资大师巴菲特在给其老师本·格雷厄姆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所写的序言中说：“长年进行成功的投资并不需要极高的智商、罕见的商业洞见，或内部消息。真正必要的是做决策所需的合理的知识框架，以及避免情绪化侵蚀智识的能力。”本栏目力图提供一个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的框架，从而达到把握最关键、最重要的决策信息和决策要点的效果。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和分析也将因此得到升华。

【中国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的政策实践与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绿色转型、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领域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在政策实践上具有多方面创新，有效促进了国内市场规模扩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显现。本文力求系统梳理和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的政策实践和成效，阐明新发展阶段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的现实逻辑和实践要求，提出新发展格局下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的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的政策实践及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上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创新实践，对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1. 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我国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战略选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对冲外部需求大幅收缩的冲击，取得了积极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和我国发展阶段的转换，我国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调整优化扩大投资和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更加突出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增强了发展的韧性和后劲。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充分发挥消费对经



经济增长“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我国顺应消费结构升级新趋势，出台《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等政策举措，促进传统消费提档升级，扩大汽车、家电、居住类商品等大宗消费；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信息消费、网络消费、定制消费等新型消费；拓展服务消费增长空间，发展文化、旅游、健康、养老、家政等消费，推动消费结构向品质化、多样化、服务化转型升级，消费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十三五”时期，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2013—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60.0%左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及时出台“六稳六保”政策措施，促进消费回升和潜力释放。2021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7%，比资本形成总额高出42.5个百分点。

增强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近年来，我国把扩大投资需求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在继续加强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强“补短板”“强弱项”的力度，重点扩大新型基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社会民生领域投资。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加大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强化对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大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高标准建设国家实验室等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人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十三五”时期完成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健全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机制，推动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等建设，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激发国内市场潜力、培育强大国内市场，我国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对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先后出台《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政府投资条例》《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等政策，规范政府投资管理，优化政府投资安排方式；落实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实行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备案制，最大限度缩减核准事项；确立以“精简前置、并联审批”为核心的新型核准制度，提升企业投资便利化水平。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市场准入限制持续放宽。2020年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比2016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缩减事项比例高达62%，并逐步形成“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出台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举措，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范围，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出台《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从体制机制入手激发居民消费潜力。针对健康、养老、育幼、文旅、体育等服务业准入门槛较高、开放程度不够，服务供给规模和质量不高，标准化品牌化建设不足等体制机制问题，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截至2021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达到52.5%，较上年提升3.2个百分点。培育壮大各类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线上线下消费深度融合，新兴消费特别是信息消费成为增长新引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信息消费发展态势报告2020》显示，



我国信息消费规模由 2017 年的 4.5 万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6 万亿元左右，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10%，在最终消费中占比超过 10%，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3.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具鲜明特征的宏观政策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供给体系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升级，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多，中高端供给不足等问题，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2015 年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逐步展开，对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产能过剩问题得到缓解，产业结构和生产布局得到优化。商品房库存有效化解，商品房待售面积持续下降。结构性去杠杆取得成效，企业杠杆率水平总体呈下降态势，2019 年较 2017 年下降约 5 个百分点，宏观杠杆率逐步趋稳。降成本取得明显进展，大力度减税降费，推进“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有所下降。补短板取得积极进展，农业农村和生态环保等领域投入大幅增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实践中不断深化。2018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明确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巩固”，就是要巩固“三区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就是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就是要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就是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八个字，强调的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的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强调的是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强调的是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让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的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从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止跌回升的态势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4. 加强全国统一市场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围绕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取得长足进展。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发展迅速，但要素市场发育明显滞后，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相对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仍不健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针对农村土地长期被排斥在土地市场之外，加快修改完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制定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指导意见等改革举措。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受到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的制约，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放开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增加服务小微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同时，加快培育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培育发展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探索建设数据交易市场。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清理规范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清除影响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壁垒。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对新制定法规和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组建市场监管总局，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体制。出台《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关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等6部指南，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形成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的格局。

5. 加快经济发展绿色转型

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关键在推动经济发展摆脱对高消耗、高排放和环境损害的依赖，转向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排放减少与环境改善相互促进的绿色发展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围绕绿色转型开展一系列战略部署，推动绿色转型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

推动绿色转型力度空前。我国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等政策举措，确立了生态文明体制的“四梁八柱”。“十三五”时期，修订《环境保护法》，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展开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趋于改善。严格遏制高能耗、高排放行业盲目发展，大力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的制造业体系。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绿色消费、绿色出行成为新趋势。

推动落实“双碳”目标。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国际社会作出力争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郑重承诺。“十四五”规划明确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3.5%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等约束性指标，并将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20%左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相继出台文件，从发展清洁能源、完善碳交易市场、压缩粗钢产量、落实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建立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等方面，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制定行动方案。

6. 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与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相辅相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对外开放的内涵、层次、水平都明显提升，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融合度明显提高。积极推进规则、规制、标准等与国际对接。我国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19个自由贸易协定，自贸协定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接近35%。推动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落地实施。积极参与国际多双边经贸投资协定谈判。对照国内改革方向、举措和时间表，积极回应相关新议题，包括调整规范产业补贴政策，清理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差别待遇政策。深化政府采购改革，对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境内生产的产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面对新一轮全球规则竞争的压力，我国主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趋势，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建设制度型开放高地，并大幅压减《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构建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积极推进简政放权和“放管服”改革，不断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外资企业营商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全面加强对外商投资保护力度。2019年9月，全国人大颁布《外商投资法》，取代1979年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8年通过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1986年通过的《外资企业法》，成为我国外资管理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与原外资管理法律相比，《外商投资法》加强了外商投资保护力度，明确提出按内外资一致原则加强对外资企业管理，“竞争中性”原则得到进一步体现。



二、新发展阶段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的现实逻辑和战略意义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上升，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需总量平衡和结构匹配出现新特点。激发国内市场潜力，是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重大举措，是适应经济发展阶段性转换的内在需要，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重要途径，更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求。

1. 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是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重大举措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调整期，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大国竞争与博弈更趋激烈。2018年下半年，美国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对我国企业生产经营、外贸出口和市场预期造成多方面不利影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外部环境更加错综复杂，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快调整。当前全球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疫情冲击的不对称效应和疫情后的经济“K型复苏”，造成收入差距扩大，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强化本已上升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倾向，经济复苏中枢后移引发全球结构性问题持续演化。从中长期看，制约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如人口老龄化、全球化减速、供应链收缩等并未缓解，疫情后经济的短期反弹难以改变全球经济“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高风险”的长期趋势。面对外部环境较长时期的复杂变化，必须适时调整完善既有发展路径，把发展立足点更多放在国内，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同时，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更加注重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增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

2. 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是适应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内在需要

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往往对应不同的供需结构与匹配关系。随着近年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所缓解，而需求侧积累的矛盾逐步暴露出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需求侧恢复明显滞后于供给侧，特别是受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和未来预期的影响，居民消费恢复明显滞后，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3.9%，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6.8个百分点。消费恢复滞后，最终将传导到生产和投资领域。如果消费恢复明显滞后于生产恢复，库存就会增加，企业营收也会受到影响。随着外贸出口增长因“订单转移”效应减弱逐步回归常态，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压力就会显现。从中长期看，我国“两头在外”发展模式的局限性愈加突出，依靠外需和投资驱动、依靠生产要素的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已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强化国内市场对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这些都表明，新发展阶段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更加注重激发国内市场潜力，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优化供需结构，推动供需良性互动和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3. 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国内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显现，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与此同时，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居民消费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向质的提升，对产品质量、品质、品牌的需求日益增长，高端化、多样化、服务化特征更趋明显，服务消费比重上升，通信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旅游、教育培训、健康养生等快速增长，成为推动消费的重要力量。从发展潜力看，我国拥有14亿人口，城镇人口超过



欧洲总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美国总人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将对高品质、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产生更多需求，消费需求蕴藏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加快形成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有利于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集聚配置全球优质要素资源，增强内需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4. 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求

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从供给端着手，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也要从需求端发力，推进需求侧改革，充分释放国内市场潜力，通过供需两端相互配合、协同发力，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通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和梗阻，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以供给提升创造消费新增长点，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必须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这里的需求侧管理，不再仅仅着眼于短期政策工具调节需求总量，熨平经济周期，更是要针对制约国内需求释放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以制度建设为主要途径，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持续释放国内市场潜力。由此可见，激发国内市场潜力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在逻辑上具有内在一致性。

三、新发展格局下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的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的政策实践，为我国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新发展格局下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的政策取向提供了重要启示。

1. 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要着力扩大消费需求

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看，我国扩大内需更加注重扩大投资需求，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需求的政策工具，但在引导和扩大消费需求方面，调控手段较为有限。在按支出法计算的 GDP 中，2002 年以前我国最终消费率除个别年份外，都维持在 60% 以上的水平，在这之后逐步下降到 2010 年的 49.3%，以后虽有所回升，但近年来则稳定在 55% 左右的水平。与此同时，2004 年以前我国投资率除个别年份外，都维持在 30%—40% 的水平，2004 年后投资率上升至 40% 以上的水平。与世界各国比较，我国消费率明显偏低，投资率明显偏高。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需求结构变化，通过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逐步收窄，再像以往那样依靠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扩大投资规模，不仅投资的边际效率会大幅下降，还会增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要更加注重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

消费是潜力最大的内需。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为主转向消费驱动为主的特征更趋明显。2014—2019 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定在 55% 以上，2018 年和 2019 年分别为 65.9% 和 57.8%，比资本形成的贡献分别高 24.4 个和 26.6 个百分点，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在国民经济循环中，消费是终点也是起点。全面促进消费，推动消费回升，不仅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也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途径。为此，要适应消费变革和结构升级的新趋势，创新和丰富宏观调控政策工具，更加注重引导扩大消费需求。完善



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转向更多关注改善消费环境、完善公共服务和促进就业。加快形成与扩大消费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建立促进消费的政策评估体系。

2. 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要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供应链调整收缩和国际经贸规则加快重构，增大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加之主要经济体复苏进程加快和通胀水平上升，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有可能提前转向，并将引发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动荡。我国经济恢复基础仍不牢固，居民消费恢复滞后，投资增长后劲不足，出口增速受“订单转移”效应减弱影响将有所回调，必须进一步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稳定和扩大总需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与此同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给侧，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必须坚持以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改善供给结构，培育和创造消费新的增长点。

把激发国内市场潜力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既要着力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扩大内需的支持政策，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也要坚定不移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充分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激发国内市场潜力、扩大国内需求的积极作用，进而实现供需良性互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3. 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要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创新

当前，激发国内市场潜力仍受到体制机制制约。比如，扩大消费需求，就受到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的直接冲击。从居民收入差距看，2019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已连续20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比较2019年全国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组，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为10.4倍，与中间偏下收入家庭的差距为4.8倍。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边际消费倾向更强的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放缓，对扩大消费形成明显制约。从居民部门杠杆率看，近年来，居民个人住房贷款快速增长，2020年在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仍增长14.6%。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往往伴随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回落，对最终消费形成挤出效应。

激发国内市场潜力，既要发挥短期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作用，采取适度规模性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稳定和扩大国内需求，更要针对制约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一是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二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具有再分配功能，对引导消费、储蓄、投资有重要作用。要健全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逐步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加大划转部分国有资本收益充实社保基金的力度。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和大病保险制度，加快落实异地就医结算制度。简化社保参与、转移、接续等手续，加快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三是降低居民部门杠杆率。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完善长租房政策，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监管，严控信贷资金过多流向房地产市场，降低高房价和居民高杠杆对消费的挤出效应。

4. 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要加快培育绿色发展新增长点

绿色转型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关系到我国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现代产业体系的全方位调整。实现“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国绿色转型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又孕育着新的机会。从碳排放发展趋势看，相比较于欧美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50—70年过渡期，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过渡时间仅为30年。这一方面意味着更陡峭的节能减排路径，我国为实现“双碳”目标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要远远大于欧美国家；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在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的节能降碳和绿色转型潜力巨大，并将释放出巨大的市场需求。

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双碳”目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明确阶段任务、实现途径、政策体系、保障措施，完善推进实现“双碳”目标的财税、价格、金融、土地、政府采购等政策。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实施重点行业领域节能降碳行动，工业领域推进绿色制造，建筑领域提升节能标准，交通领域加快形成绿色低碳运输方式。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抓紧部署低碳前沿技术研究，加快推广应用降碳技术，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完善能源“双控”制度，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市场化生态补偿，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大幅增加绿色消费产品市场供给，以绿色消费促进经济绿色转型。

5. 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要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互动

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必须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制度型开放，增强主动配置国内外要素资源的核心能力，提升国内市场对全球优质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努力将中国打造成为全球资源要素的强大引力场。一是要从被动地履约式的政策性开放，转向全面自主均衡的制度型开放。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来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近20年的开放进程主要是遵守既有国际规则“履约式”的开放的话，那么新发展阶段对外开放必须更具主动性，更加契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实现自主开放、均衡开放、制度性开放。二是要从注重便利化层面的改革转向更加注重自由化层面的改革。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通过降低关税水平，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持续提高，但要素自由流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仍然较低，要素跨境流动政策仍然存在较多限制，特别是服务市场自由化滞后，迫切要求大力度推进市场自由化改革，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以更短的负面清单、更便利的市场准入、更透明的市场规则、更健全的服务体系、更有效的权益保护全面激发国内市场潜力。三是要从眼睛向内的体制机制创新转向眼睛向外的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当前，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构，2018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先后有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等超大自贸协定签署。这些协定关注的重点已从传统的关税、配额、海关监管、非关税削减等“边境措施”，转向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知识产权、竞争法规、国有企业、监管框架等“边境内措施”，我国需主动对标先进经贸规则，提升与



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的相容性，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培育和激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

【来源:《区域经济评论》，作者：王一鸣，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Top](#)

**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我们的客户——
提升竞争优势，共同创造持续长远的收益**